学习形式：集中学习

学习日期：3月21日

学习地点：四楼会议室

领学人：徐苇兰

改革开放史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任务，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使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首先，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和浩劫，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中国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号召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其次，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50- -60年 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奋力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因此，30年前中国之所以选择和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双重逼迫”的产物。这是-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但肯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走到了低谷、绝路、死路，一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不能不使人们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思。历史就是如此辩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向了绝境，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呼声或许不会那么强烈、那么坚决、那么不可摇撼和不可战胜。坏事变好事，因为它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这样辩证认识这一-问题的。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契机。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就不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不会打破坚冰、拨乱反正，就绝不会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而言，我们怎样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恐怕都不为过。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一切习惯势力、一切旧势力是不会迅速自愿推出历史舞台的。积弊已久，积重难返。中国要选择和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又谈何容易!所以，30年前，改革开放这个选择，本身也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经过两年的徘徊时期，经过萦绕不绝的痛定思痛，经过同仍然继续坚持“左”的惯性思维力量的反复的较量和斗争，经过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才终于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一-走改革开放之 路。在这场历史性的选择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展现自己的大智大勇，高瞻远瞩，拨雾见云，把中国这艘遍体鳞伤的巨轮引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航道。正是因为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作出别样的选择一-继续闭关锁国， 继续故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那么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的一一个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说，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披荆斩棘的壮举，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坚冰已经打破，迷雾已经拨散，航道已经开辟，航船已经升火，舵手正在挥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就是由此缘起，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揭开辉煌壮丽的篇章的!

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08年已经进行了30年，大致可以分为4个重要阶段。参引逄锦聚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基本经验》-文。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10月)。 改革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张包产到户的约定 上按上自己的手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在这一阶段，理论创新和思想准备也完成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大胆改革。我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1984年10月一1992年1月)。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进入这一阶段的标志。在这一阶段，我国经受了20世纪8o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和1988- 1991年经济发展剧烈波动的考验，我们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累了经验，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理论上也取得了突破: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第三阶段:全面推进，改革攻坚，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 制为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改革阶段(1992年1月一2002年10月)。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巩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国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中，在实践上，我们曾经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经济风险的考验，积累了消除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的经验，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理论上，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11月- 2008年12月)。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十六大以来，我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继续改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同时，我国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作了全面部署，是改革开放新阶段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2008年10月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这一-阶段， 我国万众一心抗击南方暴风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了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和不可战胜的精神!面对美国华尔街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计划投资4万亿元，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储备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从容不迫的信心!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书卷，阅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篇章，领略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一往无前的宏大魄力吧!

第一章

胜利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1976年不到1年的时间里，巨星陨落，天柱倾折，中国相继失去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位伟人。广大人民群众悲痛欲绝、泪湿衣襟。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他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悲痛。

此时，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的“四人帮咖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胜利粉碎了“四人帮”集团。

一、“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四人帮"就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江青还想方设法盜窃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材料和手稿，企图加以篡改，作为篡党窃国的依据。姚文元等还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联一些人给江青写 “效忠信”、“劝进书”。与此同时，“四人帮”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中，于1976年9月16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9月17日起，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再三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各中央新闻单位据此对“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进行了反复的重点宣传。

“四人帮”伪造并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一“临终嘱咐”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毛泽东在临终时给他们作了“临终嘱咐的假象，借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既定方针”，继续打击邓小平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其实，毛泽东在临终前一直处于弥留之际，昏睡不醒。1976年9月7日 ，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要看书。他语言的含糊与声音的微弱，连最能听懂他讲话的机要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个“三”字，给了机要秘书，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床的床头。机要秘书这才猜出了他的意思，他是要看关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时正是三木武夫准备下台的时候，当秘书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一本书，拿给他看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态。但是，毛泽东的手已经没有托住三木武夫这本书的力气了，尽管这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书，只好由别人为他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三木武夫的这本书是毛泽东阅读的最后一本书。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清醒的瞬间，还在关注着世界形势和五洲风云。按照多年养成的老习惯，新华社每天编辑的两大本反映世界各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动态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无论多忙多累，也是要亲自阅读或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的。

所以说，毛泽东在临终之前，根本没有作过任何“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并提出她和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以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毛远新都要参加会议，却不让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以便研究江青提出所要解诀的“重大问题”。

华国锋问江青:“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

江青又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纠缠着要求华国锋同意将毛泽东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手稿交给毛远新整理，企图由她来垄断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手稿等资料，以便随时可以伪造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

在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的问题，图谋篡权。会前，从1975年下半年起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曾经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毛主席逝世了，我的联络员使命也结束了”，要求同意回辽宁省委工作。但是，当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让毛远新回辽宁的时候，江青却大发脾气，坚决反对。张春桥也提出毛远新不能走，要让毛远新整理毛泽东留下的手稿、资料，要由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等等。

当“四人帮”的无理要求均遭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否决之后，江青破口大骂，胡搅蛮缠，闹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以后，江青又多次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汪东兴征求了叶剑英的意见后，予以坚决拒绝。

在此期间，“四人帮频繁活动，与上海的同党之间“热线"不断。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要“闹事了”。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和人民就要遭难，中国的历史就不知道又要倒退多少年。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准备粉碎“四人帮”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华国锋、时创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站到了精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线。

华国售，山西人原名苏铸。他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工作，“华国锋的名字就是取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之意。他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锻炼成长为一名中共县委书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担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国锋历任中共湖南省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行政公暑专员: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受到批斗。以后。他历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913事件后，。华国锋被毛泽东选拔到中央工作，历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从1976年起，他相继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与华国锋在一一起。

叶创英广东人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随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为黄埔军校筹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率部先后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前名，1927年7月上旬，经共产党员介绍、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担任国民英金军第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充满观辛与辉煌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程。2月中下旬，他与贺龙、叶摄导在九江甘常湖，艘小船上秘密开会，通报了汪精卫等打算借召集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之机将他们扣留的消息。这促便贺龙、叶挺及时率部进驻南昌，举行南昌起义。同年底，叶剑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红军副总指挥。

在土地革金战争时期，叶剑英于1928年奉中共中央派遭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防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课长7、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

长征中，叶创英任中央革命车事委员会第1级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员会第1 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后:叶创英任副司令员兼军委第局局长，负责都队的行军作战。遵义会议期间，叶创英在红军总司今部作战值班室处理军务，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会后，叶剑英任红3年团参谋长。红军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创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这时，张国寿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叶创英截获张国寿打给红军的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后。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果断决策，李中共中央、军委纵队和街新3军脱离危险区域，粉碎了张国寿的阴谋。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的重要行动，保卫了中共中央，保证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